

邓小平 与中美外交风云

宫力 著



红旗出版社

邓小平

与中美外交风云

宫力 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与中美外交风云 / 宫力著. --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051 - 3316 - 7

I. ①邓… II. ①宫… III. ①邓小平(1904~1997) - 生平事迹
②中美关系 - 研究 - 1974~1997 IV. ①A762②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4987 号

书 名 邓小平与中美外交风云

著 者 宫 力

出 品 人 高海浩

总 监 制 徐永新

出版统筹 张景涛

选题策划 万方正

责任编辑 万方正 董良敏

实习编辑 张 燎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727

编 辑 部 010 - 64038529

E - mail hongqi1608@126.com

发 行 部 010 - 64024657

欢迎品牌畅销图书项目合作

项 目 部 010 - 84026619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500 千字

印 张 31

版 次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1 - 3316 - 7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与中国大战略

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与中美外交风云》就是一本全面解析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力作。这部著作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官力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研究”的最终成果,凝结了他多年的学术积淀。在邓小平诞辰 110 周年之际,这部著作得以再版,实为学术界一大幸事。

作者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以邓小平的重大对美外交决策和活动为基本线索,系统地归纳、总结了邓小平对美战略策略思想的形成、演变、发展的过程。

作者紧紧抓住邓小平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清晰地展现了邓小平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到 90 年代初这 20 年间,领导中国党和政府处理对美关系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出邓小平的对美战略策略思想,并分析了其发展变化的轨迹。

全书正文共 10 章。第 1 章是背景铺垫,概述了邓小平对美外交实践和政策思想产生与形成的历史背景,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第 2—3 章介绍了邓小平从文革中期复出至 1976 年再次被打倒这段时间内,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参与中国对美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情况,以及邓小平本人的一些对美政策思路的形成,如把中美关系稳定在一定的战略水平之上,等待形势的变化。这些思路为以后对美政策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第 4—5 章叙述了从 1977 年再次复出到 1982 年这一阶段邓小平的对美外交实践,在此基础上总结了邓小平对美政策的一些重要思想,如从世界格局和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战略高度出发考虑对美政策,在中美关系中突出经济因素,实行真正的“不

·
·
·
·
·
·
·

序

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与中国大战略

结盟”、不打牌政策等。这是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体系形成的阶段。第6—8章涉及的内容是1982年至1989年这段中美关系“发展期”。在这一阶段，邓小平提出了系统的对美政策思想，比如：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科技、经济因素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外开放是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来处理国际争端，用“一国两制”构想实现祖国统一，等等。这些重要论断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是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成熟期。第9—10章总结了1989年至1992年期间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进一步升华。这是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大动荡的时期。为了应对复杂的局面，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不扛旗、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一系列战略策略方针。在此基础上，针对中美关系又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加强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邓小平的思想为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有利于中美关系走出僵局，健康发展。

在导言中，作者对邓小平的对美政策思想发展脉络做了归纳，特别是对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高度概括。作者认为，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主要内容有：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认为美国与苏联争霸必然导致世界战争的传统看法；中国的对美政策要服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工作重心，要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改变“一条线”战略，与美国拉开一定的距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不打牌的政策；要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处理中美关系；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决不允许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把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同发展与美国这个国家间的关系区别开来；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发展同美国的关系；用一国两制的思路解决中美之间最敏感的台湾问题；面对动荡的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的风云突变，把握住集中力量将己的事情办好这一根本立足点，走自己的路。

此外，在导言中，作者还总结了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基本特征。第一，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观点出发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是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精髓；第二，在中美关系中突出经济因素的作用；第三，强调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基本立场，在涉及国家独立和主权的问题上毫不含糊；第四，以两手策略对付美国的两面政策。

从全书的内容、结构可以看出，该书是研究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研究20世纪70—90年代中美关系的力作。

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丰富而精深,《邓小平与中美外交风云》对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阐释全面而精到。但依笔者之管见,最值得称道的是,这部论著较全面地展示了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与中国大战略之间的紧密联系,从中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的高度来解读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观点出发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是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精髓。”确实如此,邓小平从来不是孤立地看待中美关系,而是首先将中美关系同中国的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联系起来,将发展对美关系看成是为改革开放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关键环节。

邓小平对美外交实践虽然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中美关系解冻后他主持中美建交谈判时期,但是,那时对美外交的大政方针是由毛泽东拍板制定的,邓小平本人的对美政策思想尚未形成或展示出来。邓小平作为对美外交的决策者,是在 70 年代末他再次复出之后。做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大战略决策,是邓小平掌握对美政策最高决策权后的第一次重大对美外交实践,也是他外交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页。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得以有机会展示出来。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相比,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将美政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紧密联系起来。

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转折也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非常好的契机。实际上,中美建交谈判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是同步进行的。建交公报早于三中全会召开两天发表,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与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路线几乎是同步,这两者之间确实有一种内在的、有机的联系。”

就对美政策来讲,中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这一基本国策的确立,构成了中国发展对美关系的重要推动力。

首先,中国需要引进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管理方法。作者列举了邓小平从1977年5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系列言论,说明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反复强调引进先进科技和管理方法的重要性。比如,邓小平说:“世界科学技术在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各个科学领域一日千里地发展,一年等于好几年,甚至可以说一天等于几年。一个新东西发明出来,可以带动其他方面走得很远。”“如果不拿现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创造条件,努力奋斗,恐怕就

没有希望。我们还要吸收世界先进的工业管理方法,要搞科研,搞自动化。”

其次,中国要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对外开放,而美国则是重要的开放对象之一。作者通过梳理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邓小平要用对外开放来带动中国经济腾飞。尽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还未使用“对外开放”这个词。邓小平认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固然需要自力更生,但也要争取外援,需要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引进资金和技术,为此就必须对外开放。邓小平在1978年10月对联邦德国客人说:“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邓小平这里所讲的“先进国家”,自然包括美国。所以,向美国开放,向美国学习,客观上就要求同美国有一个“正常的”关系。中美关系正常化势在必行,顺理成章。对外开放是中国要发展对美关系的一个新的动力。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作者特别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之间的互动。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固然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这种大好局面的形成,也得力于70年代初以来中美关系缓和所造就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中美缓和及其影响,不仅使中国争取到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友好相处的有利局面,改善了由于中苏对抗所带来的不利态势,同时也在开放意识、在现代化等方面,影响着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动。可见,中国内政的变化与中美关系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局面。

邓小平从大战略高度把握对美政策,不仅体现在将对美政策与中国的发展战略紧密联系起来,还体现在将对美政策与中国的整个国际战略紧密联系起来,将对美战略看成是国际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上。《邓小平与中美外交风云》在这方面进行了很深入的探讨,并用专章进行阐述。

伴随着工作中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中国领导人需要对国际形势进行科学的分析、判断,看看是否能争取到较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以便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正如作者所说的:“对于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最高层次上的战略判断,也是一个国家制定和调整对外战略的重要依据。”作者认为,在经历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紧张和动荡之后,世界局势终于透出了曙光,开始出现了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为缓和的趋势。邓小平及时、敏锐地注意到这种重大变化,逐步改变了过去中国曾一度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判断。到80年

代中期,邓小平根据新的国际形势,逐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新论断。在1983—1987年间,邓小平在许多场合阐述了他对时代主题的看法。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98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采用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提法。

将和平与发展确认为时代主题,为中国调整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提供了依据,为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解除了后顾之忧。邓小平在1985年时总结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这表明,如何判断时代主题对实现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至关重要的。

对时代主题的认定,是对最高层次国际战略环境的评估,也涉及对世界主要战略力量的认识,这对中美关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肯定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认识有了改变。以往,中国领导人担心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主要是因为美苏两家尖锐对峙,并大搞军备竞赛。邓小平通过科学分析,认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而和平力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此外,由于美苏两家所拥有的核武器及常规武器足可以“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去发动战争。再者,“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可以看出,在邓小平心目中,美国与当年肆意发动侵略战争的法西斯德国、军国主义日本是不一样的,中国可以同美国这样的国家发展正常的双边关系,共同促进世界和平。

第二,肯定世界大战可以避免,表明中国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而不必把主要注意力用来准备打仗。“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现在,“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正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对战争与和平的形势有了较为乐观的估计,中国才毅然在1985年决定主动裁军100万,并建议所有

核国家就不使用核武器、停止核试验、停止核生产达成协议。中国的行为对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极为有利,同时也为发展中美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氛围,美国公众更容易认可美国政府同中国接近,在各领域同中国发展关系。

第三,确认和平为时代主题,有利于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在“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各国从自身的安全出发,往往迫不得已奉行结盟政策。而在以和平为主题的时代,爱好和平的国家有条件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就中国来说,“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此,“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独立自主、不结盟、不打牌的政策,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第四,确认和平为时代主题,表明中国要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邓小平在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时,不仅仅局限于考虑中国自身的安全,他的视野更为广阔。1984年2月22日他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谈道:“要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总要想些主意。”当然,中国也需要和平,世界和平与中国的根本利益是相统一的。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将维护世界和平确立为自己的对外政策目标和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这意味着,中国不是要搭乘世界和平的便车,而是要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中国是“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定位对中美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需要发展同美国的关系,但不会对美国亦步亦趋,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不以美国划线,而是以和平划线。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使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时更加自主、灵活。

第五,摒弃了“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提法,为发展对美关系扫清了意识形态障碍。在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如果同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关系过于密切,就会出现“革命立场”问题。意识形态的羁绊曾是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在确立了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之后,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上才放开了手脚,“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决定亲疏

好恶,对一切国际事务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并把反对霸权主义同发展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区分开来”。这实际上是外交工作中的思想解放,这种思想解放对发展中中美关系极为有利。

正是由于发展中美关系既符合中国长远发展的战略利益,也符合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要求,所以邓小平非常重视中美关系,就是在中美关系处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仍然充满信心,坚信中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超过分歧与矛盾,两国关系遇到的挫折只是暂时的。“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

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的角度来阐释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只是《邓小平与中美外交风云》这部巨著的突出特色之一。作为一项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成果,该书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不仅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有很强的应用价值。作者运用了极为翔实的文献资料,既囊括了几乎所有研究邓小平思想和 20 世纪 70—90 年代中美关系的公开发表的重要文献,又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原始档案资料。书后还附有“邓小平对美外交活动大事记”,以编年体形式记叙了邓小平从 1974 年至 1997 年的重要对美外交活动。

尤需提及的是,本书作者官力教授长期从事中美关系和中国领导人对美政策思想的研究,著述甚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的这部《邓小平与中美外交风云》无疑是他的得意之作。可以说,本书是可供学界进一步研究中美关系和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极好的参考书,也是学人了解中美关系和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一部震撼人心的力作。

刘建飞

2014年3月10日于中共中央党校

····· 导言

001

特别是在 1977 年之后,邓小平成为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人^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敏锐地把握历史机遇,并积极应对国际形势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做出了战略决断,并在中国为实现现代化努力奋斗的历史背景下,全面推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深入研究邓小平的对美政策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处理当今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把握中国外交的航向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以历史发展的脉络为序,邓小平的对美政策思想和实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文革中期复出至1976年再次被打倒。这一阶段,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直接参与了中国对美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并参与和主持了多次中国对美会谈,由此积累了对美外交的经验。

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并介入外事活动,成为周恩来在对美外交方面的有力助手。后来,由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逐步担负起更大的责任。1974年经毛泽东亲自提议,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参加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向国际社会阐述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提出了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并开始代替周恩来,担负起中国与美国高层会谈的主要责任。

在此之后,邓小平注意分析和研究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和变化,按照毛泽东“一条线”和“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参与制定中国的对美政策。他先后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美国总统福特进行了重要会谈,反对美方提出的“倒联络处”方案^②,坚持了中国与美国建交的三项原则^③。为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作出了贡献。

在此期间,邓小平一方面对美方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一些倒退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从国际反霸统一战略角度出发,尽量拉住美方,维护“一条线”的战略格局,把中美关系稳定在一定的战略水平之上,等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对美外交中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思路,为后来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从1977年再次复出至1982年。这一阶段,邓小平主要是为适应国内战略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需要,重新审视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国际问题和中国对美外交政策的新思想。

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在他的极力倡导下,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且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这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在国际上,此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把苏联作为主要敌手,因而两国都需要在各自的对外政策中增加互相协调的因素。在此背景下,邓小平从世界格局和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战略高度出发,指导了中国的对美谈判,加速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1979年,邓小平对美国的访问,加固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协调关系,随后,在中国“教训越南”的过程中,中美关系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与此同时,由于邓小平在中美关系中突出经济因素,中美经贸关系开始加深并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中美贸易协定的正式签订,使中美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的问题获得解决,从而加强了中美经贸发展的势头。此外,在邓小平的关注下,中国与美国在文化、科技甚至军事关系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但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争端。这主要由于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违背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原则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并且在暂停一年之后重又恢复向台湾当局出售武器。邓小平对里根政府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言论,以及提高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质量和扩大其规模做出了强烈的反应,而且抓住中苏关系有所缓和的机遇,适时调整了对美政策,与美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在此期间,中美双方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中美关系存在着倒退的危险。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国方面据理力争,与美方进行多次谈判,终于在1982年8月17日,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即中美“八一七”公报)。

在此过程中,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判断,在中国外交思想方面实现了两个重要转变。一是改变了长期以来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看法,二是在1982年正式改变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与美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不打牌的政策。这表明邓小平对美外交思想体系已经形成。

第三阶段:1982年至1989年。在这一阶段,邓小平提出了系统的对美外交思想。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确定了对美外交的战略目标、基本指导原则,并突出了对美外交中的经济因素,促进了中美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关系的稳定发展。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进入成熟期。

在此期间,邓小平逐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提出了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揭示了科技、经济因素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提出了对外开放是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提出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来处理国际争端的新思路,以及一国两制的方针等。这些重要论断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高速发展阶段,邓小平倡导的中国经济改革日益引起美国的兴趣。中美之间以经济贸易为基础的交流与合作大大

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全面展开。邓小平抓住时机,一再要求美国放宽对中国技术转让的限制,取得了巨大成效。到1988年,中美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在华投资项目已累计达630个,协议金额34亿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的14%。中美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文化教育新闻以及军事交流也有了长足的进展。两国政界、军界高层领导人的互访也日益扩大。

但在中美关系相对平稳发展的同时,双边关系中也出现了一股暗流。那就是随着美苏、中苏关系的缓和,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人权因素开始上升,美国时常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说三道四,横加指责。1987年美国国会还通过所谓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并邀请达赖访美,这给中美关系投下了不祥的阴影。此外,美国一方面向台湾继续出售武器,另一方面又在所谓中国向伊朗出售“蚕”式导弹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也引起了双方的一些争执。对此,邓小平及时提出了有效的应对措施,并从总体上稳定了中美关系的大局。

第四阶段:1989年至1992年。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邓小平外交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是为应对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和冷战后的国际风云变化,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不扛旗、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一系列战略策略方针,为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在对美关系方面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加强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使中美关系逐步走出僵局。

1989年6月,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使中美关系发生逆转,中美关系跌入低谷。中美双方在人权、对华最惠国待遇、武器扩散等问题上出现一系列的摩擦和争斗。

进入90年代,苏联以及东欧发生剧变,使美国受到鼓舞,由此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企图以压促变。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坚持内政不容干涉的原则,不怕鬼,不信邪,沉着应对,坚决顶住西方的压力,并逐步稳定了国内政局。

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外交战略层面赋予“韬光养晦”这一中国历史典故以新的涵义,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提出要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不扛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由此避免了引火烧身,避免了因大国对抗而导致局面失控、影响国内现代化建设大局的不利情况的出现。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还提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

轻重,是能够并且应该有所作为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消极的方针而是积极的方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方针。

在此期间,邓小平为了不使中美双边关系完全破裂,还提出了中美关系总是要好起来才行的战略思路,并与美国总统布什特使斯克罗夫特和国务卿贝克进行了重要会谈。与此同时,为排除美国国会以继续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干扰,中国方面在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指导下,陆续采取了一些缓和中美关系的措施。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就国内外局势和中国的发展战略发表了重要谈话,提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的方针,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邓小平的对美政策思想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既是其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框架和内在逻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既是对毛泽东对美政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在一系列问题上有了新的思路 and 理论创新。具体说来,邓小平的对美政策思想有以下一些方面的内容:

(一)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认为美国与苏联争霸,必然导致世界战争的传统看法。邓小平通过对美国和苏联的长期观察,以及对国际局势进行的科学分析,对美国和苏联有了一个客观的认识。由此,他逐步提出了世界大战是可以推迟甚至是可以避免的;在可以预见时间内,美国和苏联不会发动世界大战;世界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的力量,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中国应利用这一机遇尽快发展自己。这就为全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并且为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立新的对美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中国的对美政策要服从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工作重心,要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邓小平一贯认为,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在国内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要形成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则要争取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的、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而要做到这一点,搞好同美国的关系是一个关键。此外,邓小平还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美国的资金和技术,需要借鉴美国的先进经验和管理方法,而美国也需要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因而,中美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大局。

(三)改变“一条线”战略,与美国拉开一定距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不

线”的联美抗苏战略,但到了80年代,国际局势有了很大的变化,邓小平因势利导,及时调整了中国的对外战略,不再与美国一起共同对付苏联,不与任何大国形成结盟关系,不参加任何国家集团;在国际关系中,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这一系列战略调整把中美关系置于新的基础之上,由此维持了国际战略力量格局的平衡,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1986年6月18日,邓小平在总结中国外交经验时指出:“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样,我们国家的政治分量就更加重了。这个政策很见效,我们要坚持到底。”^④

(四)要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处理中美关系。对时代主题的认定,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也是中国更好地展开对美外交的前提。邓小平通过纷繁的世界各种矛盾的表象,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和契机,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精辟地指出:当今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其他许多问题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⑤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国对美外交必须要有全新的思维,必须要有许多新的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做法。

(五)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决不允许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在处理中美关系时,邓小平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特别是1989年之后,美国对华实行以压促变的政策,在国际上带头对华进行制裁。邓小平坚持原则,与美国的反华举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明确提出,首先,中国内政不容干涉,中国的内政要由自己来管;第二,中国从不惧怕压力,是压不垮的;第三,处理中美关系既要考虑自身利益,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由此,顶住了美国施加的压力,打破了美国对华“西化”、“分化”的图谋。

(六)把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同发展与美国国家间的关系区别开来。邓小平在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严格把反对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做法,与发展同美国国家间的关系区分开来。不再像70年代那样,把霸权主义连同奉行霸权主义的国家一起加以反对,而是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做出不同的反应,由此,维护了中美关系的稳定,保证了中美国家间关系的正常进行。

(七)超越意识形态的异同,发展同美国的关系。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有很大不同,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但邓小平在制定对美

政策时,改变了过去曾出现过的“以美划线”和“以苏划线”的倾向,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主张应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求同存异,寻求双方利益的共同点,而不应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定亲疏。在中国对美关系方面,邓小平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来发展两国关系。1986年9月2日,他回答了美国记者华莱士的提问:“中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的比同苏联共产党人的关系更好一些,这是为什么?”邓小平指出:“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的具体情况来决定。”^⑥ 这表明了中国外交已越来越趋向成熟。他始终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同时要遵循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精神,只有这样,中美关系才能避免大起大落,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八)用一国两制的思路解决中美之间最敏感的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邓小平一再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突出的政治原则问题,对于台湾问题这样的“苦果”中国人民是“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⑦因此,邓小平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一原则立场;另一方面,为了妥善地解决这一历史难题,邓小平提出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这就是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

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时指出:“‘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还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⑧随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为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上的实践,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良好的范例。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社会主义。”^⑨邓小平认为,世界上的许多争端可以用类似的办法去解决,这就为解决国家间的争端提供了一个新出路。

(九)面对动荡的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的风云突变,把握住集中力量将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一根本立足点,走自己的路。在邓小平的战略指导下,中国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朋友要交,心中有数,善于守拙,埋头苦干,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经济建设,不耽搁时间。由此,中国稳定了国内的局势,增强